

关中元墓出土仿古陶器组合的比较与分析 ——以西安新小寨元代赵氏家族墓为例

朱连华^{1, 2}

(1.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2.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陕西 西安 710068)

摘 要: 关中元墓出土的仿古陶器器形及纹饰多来自对北宋聂崇义编纂的《新定三礼图》中所载器物的模仿。2021年考古发现的西安新小寨元代赵氏家族墓地延续时间自大朝至元四年(1267)至元代晚期,出土仿古陶器数量多且呈组合出现,在《三礼图》《宣和博古图》等文献材料中可找到与之对应的器形图样。本文通过对赵氏家族墓出土仿古陶器的类型及组合关系分析,可较为清晰地认识到关中元墓出土仿古陶器器类与器形的变化特点,表现在同类器物在不同时期所依蓝本的不同,进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关中地区蒙元墓葬中广泛随葬仿古陶器这一区域性丧葬文化现象进一步解读。

关键词: 关中元墓 仿古陶器 组合关系 时代特征

Abstract: The shapes and decorative patterns of the archaistic pottery unearthed from Yuan dynasty tombs in the Guanzhong region were mostly imitations of the ritual vessels illustrated in *Xinding Sanli Tu The Newly Edited Illustrations of the Three Rites* compiled by Nie Chongyi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Yuan-dynasty cemetery of the Zhao family discovered in 2021 in Xinxiaozhai, Xi'an, dates from the 4th year of the Zhiyuan Era of the Great Yuan (1267 AD) to the late Yuan period. Most of the archaistic pottery items unearthed at the site appeared in sets. Corresponding vessel shapes and illustrations can be identified in historical texts such as *Sanli Tu The Illustrations of the Three Rites* and *Xuanhe Bogu Tu Xuanhe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Antiquitie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types and assemblages of archaistic pottery found in the Zhao family tombs, providing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of such pottery in Yuan-dynasty tombs in the Guanzhong region. It reveals changes in reference models for similar vessel types over time and builds on previous research to further interpret the widespread practice of burying such archaistic pottery in Yuan-dynasty tombs as a distinctive regional funerary tradition.

Key words: Yuan-dynasty tombs in Guanzhong; archaistic pottery; vessel sets; chro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一、研究概述

北方地区元墓中普遍出土有陶质明器,以灰黑陶为主,表面无釉、彩饰,呈现成对、成组的组合关系,除具有供祭性质的礼器,如呈“一炉二瓶”组合关系的“三供”,“一炉二烛台二瓶”组合关系的“五供”外,还包括汉代经学家想象中簠、簋、敦、爵、豆、鼎、鬯等仿三代样式的礼器,茧形壶(茧瓶)等仿秦汉样式的用器以及仿汉代陶谷仓等的模型器。

学界早有对宋元时期流行“仿古器”的观察,仿古陶瓷器的蔚然成风与北宋以来士大夫阶层对考古博物学的传播、朝廷礼制改革及对地方基层礼俗的指导关系莫大,并在元代北方地区以墓、祠祭器的形式得以延续。关于元墓随葬陶明器中仿古礼器器形来源及差异的研究,以谢明良、许雅惠等学者对甘肃漳县汪世显家族墓的观察与讨论最为深入、系统。两文皆指出其仿古器有鲜明的区域特性,并深受北宋初期聂崇义编纂《三礼图》的影响,且陕

西关中元墓中亦出土有借鉴于该书所载器形的仿古陶器,是唐宋以来对汉代经学传统下的仿古礼器形制规范的复刻与追溯^[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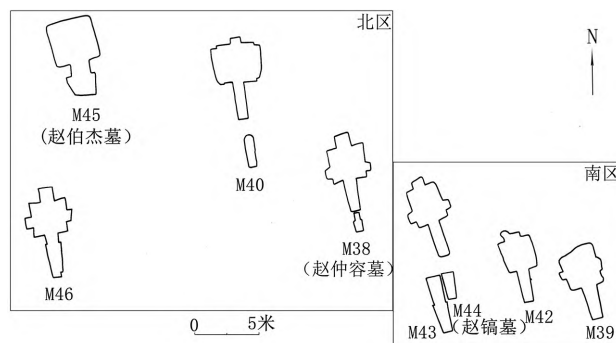
结合近年来陆续发现的考古材料,以上研究观点也得到进一步验证,同时反映出仿古陶器在元代葬仪中的使用不仅来自于《三礼图》对地方州县的指导与影响,还吸纳了朱熹在参详《宣和博古图》基础上制礼所厘定的祭器组合及样式。这一现象所体现的是宋元儒学家们对两套礼仪体系的辩论和选择,以及在制度下发、指导地方时出现的并行与交错的情况。如河南洛阳元代晚期赛因赤答忽墓、王述墓出土陶质明器中簠、簋、尊、豆、鼎、爵等为代表的仿铜礼器器形与纹样迥然有别于《三礼图》,许雅惠在对该墓出土仿古陶器造型、组合与文献所载仿古、复古器物的图纹进行比较后,指出其应直接参鉴于朱熹编著并由朝廷颁行的《绍熙州县释奠仪图》^[2]。

袁泉在谢、许两文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洛—渭”流域蒙元墓葬材料的系统梳理,对其区域及时代特征展开讨论,提出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地区元墓随葬明器中,自大蒙古国时期至元末始终存在灰陶“仿古器”的现象,“仿古器”存在来源于《三礼图》与《重修宣和博古图》的两套礼器体系,且“仿古器”与“时器”并存^[3]。而洛阳发现的两处元代晚期墓葬中所用仿古礼器则单一符合《重修宣和博古图》的器用规范,通过比较发现两套仿古陶器的使用“很可能也反映了蒙元礼器在不同时段的发展特征”,进而在区域政治与文化传统差异的语境下对“蒙元礼器制度从杂宋、金模式到‘别置新器’的发展过程”展开论述与剖析^[4]。

基于以上研究,笔者在对2021年考古新发现的西安新小寨元代赵氏家族墓的整理中,对出土陶明器的类型进行分析,进而重新审视关中元墓出土仿古陶器的组合关系与时代特征。不揣简陋,望方家指正。

二、元代赵氏家族墓基本情况

自2021年至今,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对西安南郊新小寨村元代赵氏家族墓葬进行了科学发掘与整理^[5]。根据墓葬形制、买地券、墓志及随葬器物等材料,认为该家族墓由坐北朝南(墓向偏东)的8座墓葬组成,并以居于正北偏西方向的M45为祖穴,自西北向东南沿坡原地势依次“雁翅”斜向排



图一 赵氏家族墓地墓葬分布平面图

列,且较为明显地呈现出两组区域的排列关系:北区为M45及其东南侧的M40、M38,西南侧的M46;南区为M44及其东南侧的M42、M39,西南侧的M43(图一)。

据M45出土的朱书纪年买地券砖内文记载,宣差官、领诸路质子千户赵伯杰居住于京兆府录事司章台街,生前为自己预置墓茔,大朝至元四年(1267)择址于京兆府咸宁县洪固乡莲花庄之西的坡原上营建墓室。另据M44出土的《赵镐墓志》记载,赵氏家族先世居于宣德州龙门县(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因墓主赵镐的祖父赵伯杰“乐秦”而定居于关中,“归老私第,怡乐天年”^[6]。赵镐卒于延祐七年(1320)夏六月,葬于其父武略将军、葭州知州赵仲容墓次,据此推测,位于北区M45赵伯杰墓东南侧第二位的M38即为赵仲容墓,而东南侧第一位M40、西南侧M46的墓主应是赵仲容的同辈兄弟。

赵伯杰预置于大朝至元四年(1267)的家族墓茔域范围“南北一十九步五分、东西一十八步三分”,折算约近1.3亩地,在考古现场实测中,发现该面积仅能涵盖北区4座墓葬所在的用地范围。可以合理推测,南区以延祐七年(1320)兴平县尉赵镐及孺人马氏合葬墓(M44)为中心的4座墓葬用地应是该家族的“二期”茔域。

《赵镐墓志》中记述其同辈昆弟四人,赵镐与原配马孺人诞育一子名赵睿,及一女尚未及笄。赵镐卒葬时,除孺人马氏先亡附葬外,其继室靖氏尚在。赵镐墓墓道西南侧的M43为一座竖穴墓道的单室土洞墓,其墓室狭窄,单人葬,无随葬品,推测为其继室靖氏之墓。位于赵镐墓东南侧第一位的M42应是其子赵睿之墓,第二位的M39可能是其孙辈之墓。

赵氏家族墓中除M43、M42外皆为双人或多人合葬墓,墓主夫妇下葬时间或有先后。此7座墓葬中均

出土大量陶明器，其中包括簠、簋等仿古礼器，亦有陶壶、三足炉等仿古用器，此类器物数量众多、器形丰富。此外，仓、灶组合贯穿于赵氏家族墓的始终，一座墓葬中出土的陶仓模型数量多为5及5的倍数。

三、赵氏家族墓出土仿古陶器的类型与组合关系

赵氏家族墓葬中多用陶壶、三足炉与簠簋组合等仿古陶器随葬，此外还有随葬“标配”的陶仓、灶模型组合（表一）。袁泉将“洛—渭”流域蒙元墓葬出土的“仿古器”概念界定在仿秦汉的陶茧瓶、仿商周的贯耳壶及来源于《三礼图》谱系的陶簠、簋等器物，陶仓、灶等模型器则被列入“时器”范畴，并以陶仓、灶模型器及陶壶（瓶）类古器的规律性变化作为该区域蒙元时期墓葬分期的主要依据^[7]。笔者基于此论，对赵氏家族北、南两区墓葬材料进行

分析，并参照关中元墓出土仿古器例，试对“洛—渭”流域蒙元墓葬“仿古器”的形制特征及组合关系检讨如下：

（一）陶壶（瓶）

北区墓葬中出土的陶壶（瓶）呈仿古铜礼器造型，共分为三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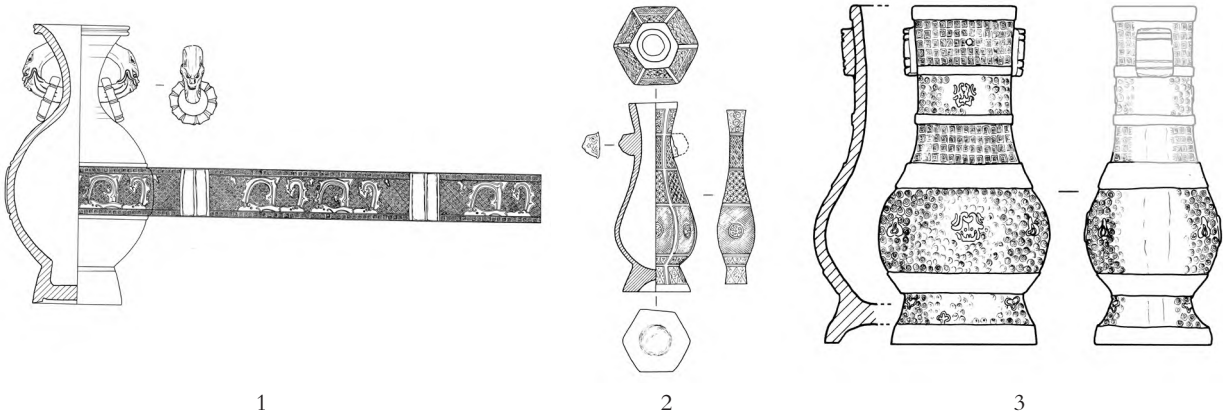
A型 兽首双环耳挂环壶。器形特征为敞口、束颈，颈部外附兽首形双环耳，耳内穿竹节状圆环；鼓腹，腹部中饰一周云雷纹及变形夔龙纹；假圈足外撇。目前仅见于M45，成对随葬（图二，1）。

B型 双耳六方壶。器形特征为敞口、束长颈，颈部两侧附小耳，垂腹，六边形井栏圈足外撇。从上至下五道横纹将壶身分六区，每区设有不同纹饰，分别为缠枝纹、菱形纹、圆钱纹、锦底纹中心附云气瓦当纹、倒三角叶联齿纹、几何纹等。见于M46，成对随葬（图二，2）。

C型 贯耳壶。器形特征为体部扁圆，直口微

表一 赵氏家族墓地出土仿古陶器情况统计表

分区	墓号	墓葬形制	下葬时代	仿古陶器（件）
北区	赵伯杰墓（M45）	阶梯墓道砖室墓	晚于大朝至元四年（1267）	双环耳壶2、簠1、簋1、三足炉6、仓5、灶1
	M40	带天井的阶梯墓道土洞墓	元代早期至中期	双耳六方壶（瓶）2、簠1、簋1、三足炉2、仓10、灶1
	M46	带天井的阶梯墓道土洞墓	元代早期至中期	贯耳壶2、簠2、簋2、三足炉6、仓15、灶3
	赵仲容墓（M38）	带天井的阶梯墓道土洞墓	元代早期	簠1、簋1、三足炉1、仓5、灶1
南区	M44	带天井的阶梯墓道土洞墓	延祐七年（1320年）	簠1、簋1、三足炉3、仓5、灶1
	M42	竖穴墓道土洞墓	晚于延祐七年（1320年）	贯耳壶2、簠1、簋1、三足炉4、仓5、灶1
	M39	竖穴墓道土洞墓	元代晚期	仓4、灶1
	M43	竖穴墓道土洞墓	不详	无 无



图二 赵氏家族墓出土陶壶（瓶）
1.A型（M45:21） 2.B型（M46:56） 3.C型（M40:63）

敞，方唇，束颈，两侧对称贯耳，弧肩鼓腹，圈足外撇。壶身通体以素面圈带分为五区，区间饰以回纹及涡纹；正反两面的颈部及腹部各附一个兽面纹饰。见于 M40，成对随葬（图二，3）。

南区墓葬中出土陶壶（瓶）仅 2 例 B 型，见于 M42，成对随葬。

比对关中地区元墓出土的仿古陶壶（瓶）类器物，赵氏家族墓中未见刘黑马家族墓 M26^[8]、张达夫墓^[9]、红庙坡元墓^[10]及延安虎头岭元墓^[11]出土的陶双耳扁壶，该器型特征为椭圆形口，长颈，扁身，颈两侧附耳，可列为 D 型。该型目前所见有两种纹饰：其一为壶身分为上下四区，其间满饰云雷纹，颈部、腹部前后各附一个兽面装饰，圈足素面无装饰；其二为颈部饰两组双弦纹，近口沿处饰蕉叶纹，下饰流云纹，腹部饰浅浮雕八卦纹，鱼子纹为底，下腹及圈足饰流云纹。

（二）三足炉

北区墓葬中出土的三足炉分为三型。

A 型 无耳鼎式，下附三足，根据足部形制可分为二亚型。

Aa 型 炉身外腹壁饰一周云雷纹及变形夔龙纹，腹下附兽首形三足，兽吻为足尖，微外撇。见于 M45、M46（图三，1）。

Ab 型 炉身素面，腹下三足无装饰。见于 M45、M40、M38（图三，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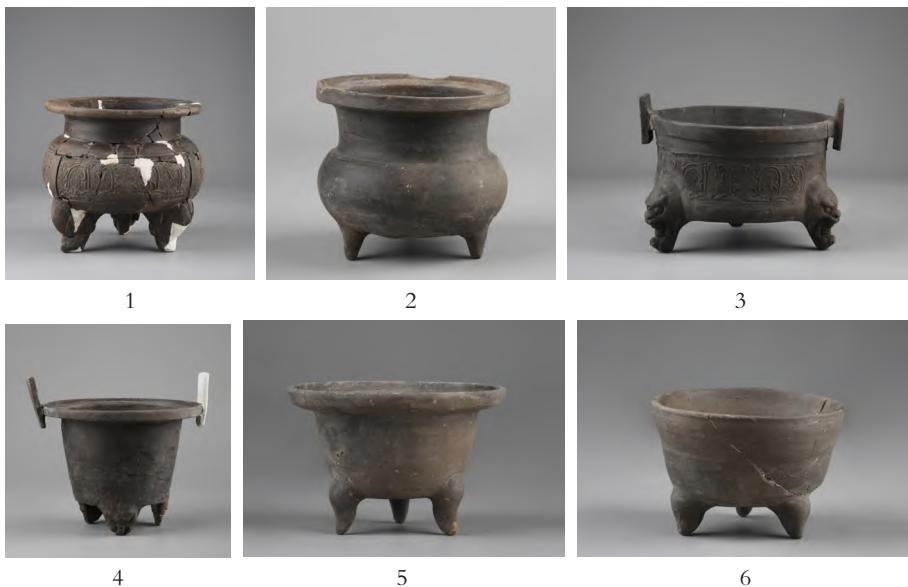
B 型 直腹鼎式，口沿两侧附立耳，腹下附兽首形三足。根据口沿形制可分为二亚型。

Ba 型 直口，腹部饰一周云雷纹及变形夔龙纹。仅见于 M45，共出土 3 件（图三，3）。

Bb 型 折沿盘口，腹壁较深，素面无装饰。见于 M40，共出土 3 件（图三，4）。

C 型 深腹盆式，深腹，平底下附三足，足呈“S”形，根据口沿形制可分为二亚型。

Ca 型 折沿盘口。见于 M44（图三，5）。



图三 赵氏家族墓出土陶三足炉

1.Aa 型（M45:26） 2.Ab 型（M40:125） 3.Ba 型（M45:25） 4.Bb 型（M40:99）
5.Ca 型（M44:50） 6.Cb 型（M46:44）

Cb 型 无沿直口。见于 M46（图三，6）。

南区墓葬中出土三足炉仅见 C 型，其中见于 M44 者为 Ca 型，见于 M42 者有 Ca 型、Cb 型。

此类仿古陶器文化特性明显。M45 的 A 型壶（瓶）与 Aa 型、Ba 型三足炉器身上装饰有相同的云雷纹及变形夔龙纹饰，整套组合特征明显，制造及随葬时间一致；该墓出土的 Ab 型三足炉应归入其他时段组合序列。M40、M42 的 B 型陶壶（双耳六方壶）、C 型陶壶（贯耳壶）与 C 型三足炉同出，组合特征较为明显；M40 的 Ab 型、Bb 型应分别列入其他时段组合序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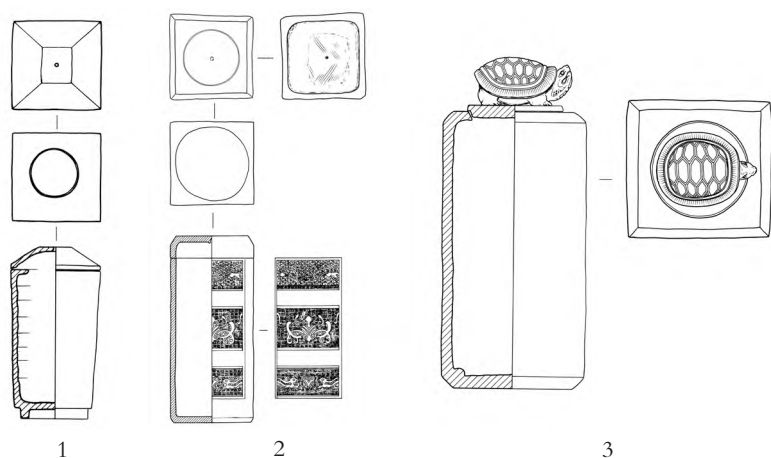
（三）陶簠、簋组合

据《三礼图》载，“簠”为盛稻粱之器，器形特征为龟盖、器身外方内圆，圈足；“簋”为盛黍稷之器，器形为龟盖、器身外圆内方，圈足^[12]。赵氏家族墓出土的陶簠、簋皆以组合形式呈现，器内未见谷物遗存痕迹，其器形源于《三礼图》但并非复刻，在器盖与器底的表现上有所变化，根据足部形制不同各分为二型。

1. 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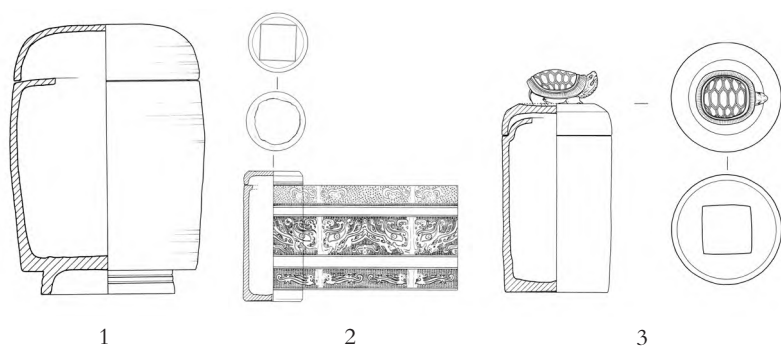
A 型 平底下附圈足。见于北区的 M45、M40 和 M38，方盖，顶部及器身制作方式有区别，如平顶子母扣用于双层器壁、盨顶用于单层器壁等（图四，1）。

B 型 平底无足。依据器盖形制可分为二亚型。



图四 赵氏家族墓出土陶簋

1.A 型 (M38:6) 2.Ba 型 (M40:46) 3.Bb 型 (M44:20)



图五 赵氏家族墓出土陶簋

1.A 型 (M40:128) 2.Ba 型 (M40:62) 3.Bb 型 (M44:19)

Ba 型 平顶方盖。北区 M46、南区 M42 出土的陶簋器身素面无装饰，另有北区 M40 出土的 1 件，器身外壁饰三周仿青铜器纹样，由上向下分别以变形的夔龙纹、兽面纹、凤鸟纹作为主纹，以云雷纹衬底（图四，2）。

Bb 型 龟盖，仅见于南区 M44，器身素面无装饰（图四，3）。

2. 簋

A 型 平底下附圈足。见于北区 M45、M40 和 M38，圆盖，顶部及器身制作方式有区别，如平顶子扣用于双层器壁、圈顶用于单层器壁等（图五，1）。

B 型 平底无足。依据器盖形制可分为二亚型。

Ba 型 平顶圆盖。北区 M46、南区 M42 出土的陶簋器身素面无装饰；另有北区 M40 出土的 1 件，器身外壁饰三周仿青铜器纹样，由上向下分别以变形的夔龙纹、兽面纹、夔凤纹作为主纹，以云雷纹衬底（图五，2）。

Bb 型 龟盖，仅见于南区 M44，器身素面无装饰（图五，3）。

比对关中地区元墓出土的簋、簋组合，大多数源自《三礼图》，少数源于《宣和博古图》，目前仅见西安陆家寨元至大四年（1311）耿伯祥墓中出土^[13]。检索现有考古材料，外观及系列皆复刻《三礼图》范本的，目前仅见于甘肃陇县汪世显家族墓^[14]。

（四）陶仓、灶组合

在大朝蒙哥汗二年（1252）至至元三年（1266）先后入葬的段继荣及夫人刘氏合葬墓中，仿秦汉茧形壶器形的陶茧瓶被赋予“五谷仓”的含义。赵氏家族墓最早使用时间不早于大朝至元四年（1267），墓中未见随葬陶茧瓶，取而代之的是整套或多套出现的陶仓模型器。

元代陶仓对汉代陶仓多有借鉴与模仿，陶灶则发展出较为鲜明的时代特征，两者在蒙元时期形成固定组合模式，常规以 5 件陶仓与 1 套陶灶成组使用。其出现之初即是随葬专用的

模型器，既不见于礼书，也无三代以降出土铜器实物与之对应。但在两汉时期随葬明器传统中，多使用与百姓日常生活相关的模型器，至宋元时期，仓、灶模型被拣选出来，形成组合关系而被继承使用，并贯穿出现在蒙元时期的“洛—渭”流域，实为与两汉传统一脉相承的“俗”器，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将仓、灶组合也纳入考察范围进行讨论。

1. 仓

多为 1 套 5 件，成套随葬。由仓身及仓盖组成，仓身呈圆筒形，肩部凸出一周，多呈平沿微下折状。依据仓底形制可分为三型。

A 型 仓底下附三足。见于北区 M45、M46、M40 和 M38（图六，1）。

B 型 平底无足。见于北区 M46、M40，及南区 M44、M42（图六，2）。

C 型 平底下附圈足。仅见于南区 M39（图六，3）。

比对关中地区元墓出土的陶仓模型器，赵氏家



图六 赵氏家族墓出土陶仓
1.A型(M45:39) 2.B型(M46:15) 3.C型(M39:9)

族墓中未见刘黑马家族墓 M20、延安虎头崙元墓出土的陶仓类型，该器形特征为以笠帽形顶盖、仿立柱斗拱席编仓身、下承底座（附云头形三足）的样式为主，可列为 D 型。

2. 灶

皆为单釜灶，由灶和釜两部分组成，灶身与烟道一体，釜、釜盖组拼。赵氏家族墓中出土的陶灶皆为圆形灶台，寰底折沿深釜，釜盖上折沿呈浅盘状，圆钮，部分釜、盖缺失。除 M40 出土 3 件外，其余墓葬内均为 1 件。依据灶底部形制可分为二型。

A 型 灶身平底微内凹。见于北区的 M45、M40 和 M38（图七，1）。

B 型 灶身无底。见于北区 M46、M40，及南区 M44、M42、M39（图七，2）。

综上，参考器物出土位置和器形特征，可将赵氏家族墓出土的仿古陶器及仓灶组合分为四组。第一组仿古陶器包括：A 型壶，A 型簋、簋，A、B 型三足炉，A 型仓、灶，见于 M45、M46、M40 和 M38。第二组包括：B 型壶，B 型簋、簋，Cb 型三足炉，B 型仓、灶，仅见于 M46。第三组包括：C 型壶，B 型簋、簋，C 型三足炉，B 型仓、灶，见于 M40、M44 和 M42。第四组仅有 C 型仓和 B 型灶，见于 M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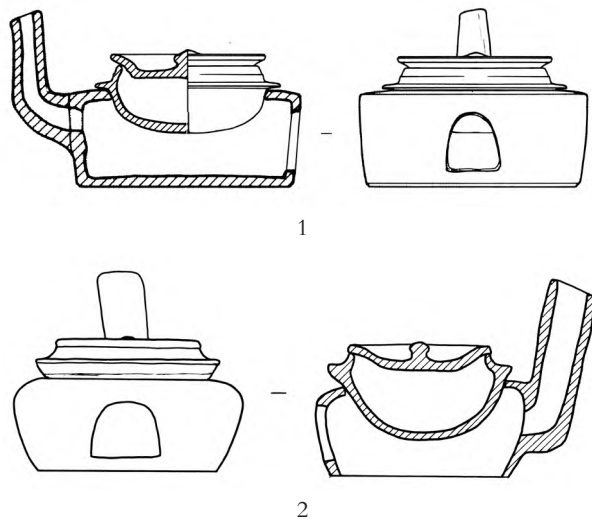
四、器形蓝本与时代特征

关中地区蒙元墓葬中广泛但并不规范地随葬仿古陶器这一区域性丧葬文化现象，是在当时这一地区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下形成^[15]，其中既有脱胎于《三礼图》《宣和博古图》中的仿古礼器，也有宋元时期仿古韵而制的创新器形，亦有承袭汉唐传统的“俗”器模型。

参考袁泉对关中元墓的分期意见^[16]，对比关中地区其他蒙元墓葬出土的同类器物，可对赵氏家族墓出土的各类仿古陶器器形蓝本及流行时代进行大致判断。

陶壶（瓶）在墓葬中多成对使用。其中 A 型在西安地区蒙元时期墓葬中较为少见，其器形可循迹于福建南平^[17]及四川三台县城西盘龙砖厂^[18]等处出土的兽头双耳（衔环）瓶，王牧指出该“器形受商周壶的影响，兽头（基本有象形与龙形两种）双耳是共性”^[19]，其流行于宋元时期的南方地区，偶见以陶明器形式随葬于关中元墓。B 型主要流行于元代中期，在西安地区还见于航天城蓝山水岸小区元墓^[20]、袁贵安夫妇合葬墓^[21]、王世英夫妇合葬墓^[22]、潘家庄元墓 M184^[23]、刘黑马家族墓 M19、西安电子城元墓^[24]等案例。C 型流行于元代中期至晚期，器形可能源自《宣和博古图》^[25]，在南方地区以瓷、铜等材质流行于世，该型明器在西安地区还见于曲江池李新昭墓^[26]、张达夫墓、潘家庄元墓 M122^[27]、青龙寺元墓^[28]、刘黑马家族墓 M26，在陕西宝鸡元墓^[29]中亦有出土。

三足炉自宋以降流行不衰并形成新的文化传统，主流器形仿自三种古器：鼎、鬲、樽，在对古意的追求中亦颇具创新旨趣。赵氏家族墓出土的三足炉类型最为丰富，共有三型六个亚型，其中 Aa、Ba 型炉底部有兽首形足，与《三礼图》中三牲鼎接近^[30]。A 型源于对金代黄堡耀州窑产品^[31]的复刻与简化，



图七 赵氏家族墓出土陶灶
1.A型(M38:7) 2.B型(M46:65)

其鼓腹造型饱满,接近鼎式炉但无双耳,亦见于刘黑马墓、刘元振墓^[32]、潘家庄元墓 M184 及 M238 等案例,流行时间在元代早期至中期早段。B 型亦见于刘元振墓等案例,流行时间在元代中期早段。C 型见于李新昭墓^[33]、张达夫墓、刘义墓^[34]及刘黑马家族墓 M19、M25、M32 等案例,流行时间为元代中期晚段至晚期。

簠和簋在蒙元墓葬中为固定组合,每组器形和装饰特征相同。除 M45 中簠、簋为内外双层器壁的结构外,其余均为单层。A 型簠、簋底附圈足,与段继荣墓、刘元振墓所出者近同,时代在元代早中期。B 型为平底无足,其中 Ba 型还见于刘黑马家族墓 M8、M15 及 M26 等案例,时代在元代中期至晚期。

元墓随葬仓、灶组合的概念与关中地区两汉墓葬的随葬器物组合一脉相承,是从“五谷仓”的葬仪格套中转化出的区域文化特征。在蒙元初期的墓葬中,陶仓形制尚呈现出多种形式,如傅元明家族墓 M11、M12 各出土带盖陶罐 5 件^[35],段继荣墓出土茧形壶 5 件,器内皆见谷物遗迹,上述两种形式皆具承两汉时期墓内设置“五谷仓”明器的葬俗,其性质与陶仓相同。陶仓是赵氏家族墓出土数量最多的仿古陶器,部分仓中还残存有谷物遗迹,其器形和内涵皆系对两汉墓葬中陶仓之模仿,共分三型,其中 A 型平底下有三足,仅见北区墓葬出土,使用时间早于延祐七年(1320),该型在西安地区还见于皇子坡武敬墓^[36]、孟村元墓^[37]、潘家庄元墓 M122、M238 及宝鸡元墓等。B 型仓平底无足,使用时间为元代中期,相同的器形还见于西安潘家庄元墓 M184、李新昭墓、袁贵安墓、张达夫墓、刘元振墓及刘黑马家族墓 M8、M9、M26 及 M32 等。C 型仓底部增设圈足以模拟台座,与西安皇子坡武敬墓、青龙寺元墓、户县贺氏墓^[38]所出陶仓相似,属元代中晚期范畴。

赵氏家族墓从始至终都随葬有仓、灶模型,且陶灶仅见圆形灶台一种样式,未见如段继荣墓、傅元明墓和刘元振墓出土的方形灶台样式。A 型在关中元墓中的使用较为普遍,使用时间为元代早期至中期早段。B 型还见于武敬墓和张达夫墓,使用时间为元代中期至晚期。

五、结语

赵氏家族自第一代赵伯杰从河北宣德迁入陕西关中定居并置办墓茔,其家族墓地延续时长近百年,

8 座墓中所葬超过五世。葬仪的选择上体现出了“入乡随俗”的特点,也充分表现了关中地区蒙元墓葬中广泛使用仿古陶器这一区域性丧葬文化现象。通过类型分析可见,赵氏家族墓地出土的仿古陶器发展脉络清晰,时代特征明确,可作为该墓地分期的主要依据。

此外,赵伯杰墓所用 A、B 型三足炉与 A 型兽首双耳壶,器身纹饰皆采用变形夔龙纹,成套定制风格明显,其中 A 型三足炉来源于金代黄堡耀州窑瓷器,A 型兽首双耳壶流行于宋元时期南方地区,在传统与流行中兼收并蓄。追究仿古陶器之蓝本,簠与簋器形与《三礼图》中相近,贯耳壶则可以在《宣和博古图》中找到同类器物,陶兽首双耳挂环壶、双耳六方壶、三足炉虽难以在上述图录典籍中找到对应器形,但其器身外壁回形底纹加兽面纹的装饰、底附的兽首形器足等多种要素可在《宣和博古图》中找到对应内容。

关中地区随葬仿古陶器器形的变化表明同类器物在不同时期制作时,所依蓝本在该区域的流传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和调整。这种现象是出于时代更新中对新事物的借鉴,也表现出受使用群体追求风尚的驱动及工匠巧思引领下的持续创新。

注释:

- [1] 谢明良. 北方部分地区元墓出土陶器的区域性观察——从彰县汪世显家族墓出土陶器谈起[J]. 台湾故宫学术季刊, 2004(19): 143—168; 许雅惠. 《宣和博古图》的“间接”流传——以元代赛因赤答忽墓出土的陶器与《绍熙州县释奠仪图》为例[G]// 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编辑委员会. 美术史研究集刊(第十四期). 台北: 国立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 2003: 1—26.
- [2] 许雅惠. 《宣和博古图》的“间接”流传——以元代赛因赤答忽墓出土的陶器与《绍熙州县释奠仪图》为例[G]// 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编辑委员会. 美术史研究集刊(第十四期). 台北: 国立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 2003: 1—26.
- [3] 袁泉. 略论“洛—渭”流域蒙元墓葬的区域与时代特征[J]. 华夏考古, 2013(3): 105—114.
- [4] 袁泉. 洛渭地区蒙元墓随葬明器之政治与文化考[J].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3(10): 61—78.
- [5] 朱连华, 郭昕. 西安曲江新区新小寨元代赵氏家族墓地[M]// 国家文物局, 主编. 2021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北京:

- 文物出版社, 2022: 186 — 191.
- [6]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西安新小寨元代赵氏家族墓 M44、M42、M39 发掘简报 [J]. 华夏考古, 待刊.
- [7] 袁泉. 略论“洛—渭”流域蒙元墓葬的区域与时代特征 [J]. 华夏考古, 2013 (3): 105 — 114.
- [8]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元代刘黑马家族墓发掘报告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8: 147 — 154.
- [9]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西安曲江元代张达夫及其夫人墓发掘简报 [J]. 文物, 2013 (8): 27 — 48.
- [10] 卢桂兰, 师晓群. 西安北郊红庙坡元墓出土一批文物 [J]. 文博, 1986 (3): 92 — 94.
- [11] 刘智. 延安虎头崙元代墓葬清理简报 [J]. 文博, 1990 (2): 1 — 6, 95 — 98.
- [12] 聂崇义, 纂辑. 丁鼎, 点校. 新定三礼图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 [13] 2022 年,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发掘于西安市陆家寨, 2025 年在西安博物院《探长安——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30 年考古成果展》中展出.
- [14] 甘肃省博物馆, 漳县文化馆. 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葬——简报之一 [J]. 文物, 1982 (2): 1 — 12; 漳县文化馆. 简报之二 [J]. 文物, 1982 (2): 13 — 21.
- [15] 袁泉. 洛渭地区蒙元墓随葬明器之政治与文化考 [J].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3 (10): 61 — 78.
- [16] 袁泉. 蒙元时期中原北方地区墓葬研究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20: 160 — 171.
- [17] 黄汉杰, 曾伟希. 福建南平窖藏铜器 [J]. 南方文物, 1998 (2): 29 — 36.
- [18] 钟治. 元代青花双环象耳瓶和三足鼎式炉 [J]. 文物, 1998 (10): 88 — 89.
- [19] 王牧. 中国南方地区宋元时期的仿古青铜器 [J]. 南方文物, 2011 (3): 143 — 156.
- [20]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西安航天城元代墓葬发掘简报 [J]. 文博, 2016 (3): 13 — 18.
- [21]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西安曲江缪家寨元代袁贵安墓发掘简报 [J]. 文物, 2016 (7): 23 — 42.
- [22]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西安南郊元代王世英墓清理简报 [J]. 文物, 2008 (6): 54 — 68.
- [23]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西安南郊潘家庄元墓发掘简报 [J]. 文物, 2010 (5): 44 — 60.
- [24] 翟春玲, 翟荣, 贾晓燕. 西安电子城出土元代文物 [J]. 文博, 2002 (5): 7 — 12.
- [25] 王黼, 等. 重修宣和博古图卷十二: 商贯耳弓壶 [M] // 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840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615.
- [26]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西安曲江池西村元墓清理简报 [J]. 文物参考资料, 1958 (6): 57 — 61.
- [27]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西安南郊潘家庄元墓发掘简报 [J]. 文物, 2010 (5): 44 — 60.
- [28]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陕西西安青龙寺元墓发掘简报 [J]. 文博, 2022 (5): 23 — 32.
- [29] 刘宝爱, 张德文. 陕西宝鸡元墓 [J]. 文物, 1992 (2): 28 — 34.
- [30] 聂崇义. 新定三礼图: 卷十三 [M]. 通志堂藏本, 1676: 2.
- [31] 王建域. 耀州柳林窖藏出土的金代耀州瓷 [J]. 收藏, 2014 (13): 112 — 117.
- [32]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元代刘黑马家族墓发掘报告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8: 28 — 72.
- [33] 马志祥, 张孝绒. 西安曲江元李新昭墓 [J]. 文博, 1988 (2): 3 — 6, 97 — 99.
- [34] 陈安利. 西安东郊元刘义世墓清理简报 [J]. 文博, 1985 (4): 5 — 9.
- [35]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西安焦村蒙元墓葬发掘简报 [J]. 考古与文物, 2024 (7): 51 — 66.
- [36]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西安南郊皇子坡村元代墓葬发掘简报 [J]. 考古与文物, 2014 (3): 21 — 34.
- [37]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西安市曲江乡孟村元墓清理简报 [J]. 考古与文物, 2006 (2): 16 — 25.
- [38] 咸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陕西户县贺氏墓出土大量元代俑 [J]. 文物, 1979 (4): 10 — 22.

责任编辑: 李唐